



熊慶來

教育思想与實踐探究

主編

刘兴育、云南大学出版社

熊慶來

教育思想与實踐探究



主編

刘兴育 /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熊庆来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究 / 刘兴育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482-0053-6

I. ①熊… II. ①刘… III. ①熊庆来(1893~1969)
—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1042号

责任编辑: 冯 峨

封面题字: 张文勳

装帧设计: 刘 雨



熊庆来
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究

主编 刘兴育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053-6

定 价: 32.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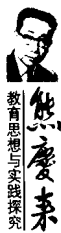
张昌山

近现代的云南，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熊庆来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熊先生是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和“伯乐”，是诗人，是爱国者，在多个领域的成就超卓。

作为数学家，他的无穷级研究成果被数学界称为“熊氏定理”，享誉世界，成为我国被国际上以其姓氏命名科学成果的少数学者之一。他是一位“伯乐”，发现和培养了众多数学英才，其中的华罗庚、陈省身、杨乐、张广厚等早已是蜚声世界的数学大家。熊先生三次出国，在外留学或研究多年，又都三次回国，特别是1957年响应祖国的号召，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此后虽然在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遭受迫害，但他从未后悔过。熊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先生学养深厚，中西融通，诗文俱佳；诗文数量虽不如专业文章多，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由他作词、赵元任先生谱曲的《国立云南大学校歌》，深受师生喜爱，传唱至今。

熊先生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作为数学家和“伯乐”的辉煌业绩，时常被人提及，故事流传，已成佳话。而作为大学校长、教育家的熊庆来，比较而言，人们说的和写的都不够，学术性的研究也不多，实在是一件憾事。

熊先生留学回国后长期在大学执教，曾任东南大学、西北大学和清



华大学的数学教授、系主任及院长等职，是我国传播西方近代数学、开拓近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先驱之一。1937年，熊先生应邀回故乡出任云南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在这十二年间，云大实现了由省立到国立、从边疆走向世界的夙愿，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中国著名大学之一。熊先生使云大走向辉煌，同时，云大也成就了一位卓越的教育家。熊庆来与云南大学已经融为一体，说云大必然要说熊庆来，而说熊庆来也不可不说云大。在教育史上，熊庆来和云大也都具有典型性。因而，研究“教育家熊庆来”就具有重要而特别的意义。

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年来，云大校内外有多位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于熊庆来研究，出了不少成果。他们中既有资深教授，又有中年学人，还有青年才俊。近期，他们以校史专家刘兴育先生的一个课题为纽带，围绕熊庆来教育思想与实践这一主题，开展广泛的学术调研，充分利用原始档案文献，多层次多视角展开研究，着力探索熊校长的办学治校之路及其成功之道，展现他的人格魅力与个性风采，进而确立熊庆来作为教育家在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应有的地位。受主编之托，有幸先一步学习本书各篇章，我深切地感受到这是作者们一次成功的学术之旅，所奉献出的是很有分量也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祝贺的同时，还希望早日印出，让更多的人分享。

当然，“教育家熊庆来”课题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可以说是一座学术富矿，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探究。无论是熊庆来教育思想的来源、构成及特色，还是其教育实践的经验、智慧与艺术等等，都值得进一步研究。现在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持续下去，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目 录

序	张昌山(1)
试论熊庆来的教育思想	张 维(1)
试谈父亲的教育思想	熊秉群(15)
熊庆来科教成就行为探源	丁宝珠(33)
熊庆来的诗词与人生	王晓珠 陈佳祺(47)
试析熊庆来教育思想及实践	刘兴育(65)
熊庆来慎选师资的理念与实践	李迎春(139)
熊庆来教育思想管窥	张志军(149)
浅析蔡元培和熊庆来教育思想之异同	卫 魏(159)
浅析熊庆来的边疆学术研究与边疆教育互动思想	
——以国立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教育研究为例	朱 军(171)
浩博宽豁 神州经纬	
——熊庆来教育思想的折射内涵与辐辏共振效应	
.....	李作新(189)
后 记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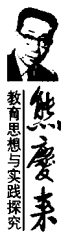
试论熊庆来的教育思想

张 维

抗日战争前夕，在北京执教的滇籍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应家乡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邀请，于1937年6月离开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的岗位，回到故里担任云南大学校长，直到1949年，任期共12年，成为云南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这12年，正是艰苦异常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难当头，物价飞涨，形势动荡，办学条件相当艰苦。为求生存和发展，熊庆来含辛茹苦，努力将云南大学从一个规模小、条件差、图书少的边疆学校，办成了一所文、法、理、工、医、农门类齐全，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的，具有相当水平的全国知名大学，被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1947年）列为中国15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熊庆来“要把云大办成小清华”的办学目标明确，办学成就有目共睹，其贡献不可低估。熊庆来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办学业绩，与其教育思想密切相关。熊庆来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借鉴。我们认为，熊庆来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一、重视地方需要，突出云南特点

云南大学的前身是1922年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1934年，东陆大学变私立为省立，更名为云南大学，院系设置几经变动，至1937年熊



庆来到职时，共有文法、理工两个学院，含法律、中国文学、政治经济、土木工程、矿冶、数理、教育7个系，以及1个医学专修科。全校共有39位教授（11位专任、28位兼任；其中本省籍29人），8名讲师（其中本省籍5人），3名助教和1名实习指导员，在校学生共302人。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有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和动物、植物资源，素有“有色金属王国”、“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之称。可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云南还是边远闭塞的省份，各方面都还很落后。之所以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云南缺乏各方面的建设人才。

熊庆来对这个问题在心中已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刚到昆明履新时，他接受《云南日报》记者的采访，便直言阐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云南省大所担负的使命，应该是推进学术研究，造就实际建设人才。本省天然条件优越，如采矿冶金、动植物等，应有专家研究。省大应该培养开发资源的实干人才。现在教育部及中英庚款均有补助，加之省政府当局热心倡导，前途的发展很有希望。”其实，熊庆来在此前便已经将此考虑付诸于实际行动。他在北京接受龙云的聘请后，要启程赴滇就任时，便有心绕道南京，专门与中英庚款董事会杭立武、李书华先生商谈此事，拟由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经费，聘请专家教授，在省大设置若干讲座。熊庆来“鉴于那时国家教育学术的发展甚不平衡，感觉能在西南经营一健全的大学应有重大意义，尤其当国势艰危之时”。到云大上任后，他便着手为达到教育部规定的国立大学的院系设置的标准，争取下一步将云大改为国立做准备。

在院系设置方面，熊庆来既重视云大多年来形成的历史基础，又重视云南地方的条件和需要。他首先将文法学院的中国文学系改为文史学系，其他的政治、教育、法律三系不变；将理工学院分为理学院和工学院（理学院保留数学系、理化系，增办植物系；工学院仍设土木工程、采矿冶金两系）；继续维持医学专修科，添办医学院。

创办医学院时，条件很差，设备简陋，经费又极少，只有空房一间

可作教室之用。熊庆来与曾获法国医学博士学位的范秉哲一起想办法，谋求地方人士、机关团体和当地医院的支持，逐步建立了解剖、细菌、生理、组织、药物及生理化学实验室各一所、教室三间。

当时云南的西医中法国学派的力量雄厚，有了甘美医院、慧群医院等几所设备条件不错的著名法派医院。于是，云大医学院便积极取得这些医院的支持，提供了良好的学生实习条件。熊庆来聘请医学院的教授时，也以留法专家为主。让云大医学院形成法国医学教学的特点，实验与理论并重，尤其注重于临床实习。故学生在第三年级开始，就有了临床实习机会，毕业之后，临床经验一般都比较丰富。云大医学院开了全国法派医学教学的先河。

1940年，医学院得到昆明富商董澄农先生慷慨赠国币77 000万元，建成楼房一座，作为“细菌学馆”；继而又得到几位地方人士捐款建造北门附属医院，供学生实习用。细菌学馆和附属医院的成立，使云大医学院成为我国大西南第一个粗具规模的教学、科研、临床相结合的医学基地。到了抗战后期，云大医学院规模渐趋完善，被当时法国报纸称为“中国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中心”。

1938年7月1日，云大正式改为国立。这段时间，全国的抗日形势越来越严峻。云南地处大后方，暂时还有些平静。在这个大动荡的时期，熊庆来所想到的是抓紧发展云大，发展院系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发展西南的文化，希望能在西南一隅培养一大批人才，为抗战服务，为国家服务。

他在任国立云大校长后，及时提出了一个“云南大学设置计划”——改为国立后，逐年扩充：第一年改文学系为文史系；并于文法学院内，增设社会人类学系；将原有之算学系，改为天算系；于工学院内添设机械系。第二年，增设农场，以为增设农学院之准备；并于工学院内增设化工系。第三年，增设农学院；于工学院添设电机系。第四年，为充实各院系设备计，拟增加经常费为国币100 000万元。

这个计划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条件出发，是切实可行的，付诸实践、经过努力之后，基本上实现了，而且农学院成立的时间还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

到1939年成立农学院后，云南大学完成了五院建制，拥有文法、理、工、医、农五个学院，符合了教育部对国立大学“须有五院建制”的要求。

二、慎选各科师资，提高学校地位

要办好一所大学，主要靠什么？熊庆来有一个极清醒的看法——“靠教授，靠好教授！”他明确地这样说过：“学校成绩之良窳，过半由教授负责。”这个观点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观点——“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完全一致。

熊庆来在师资问题是格外慎重、分外用心的。上任之初，熊庆来便明确地提出了改进的五条办法：（1）慎选师资，提高学校地位；（2）严格考试，提高学生素质；（3）整饬校纪；（4）充实设备；（5）培养研究风气。

熊庆来的目标，是要“把云大办成小清华”。他认为，要办好大学，首先要有一支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师资队伍，才能保证学校教育质量，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学术地位，也有利于学生的培养，“俾学生得善诱之誉”，因而他把“慎选师资”作为改进学校、办好大学的首要措施。云大改为国立大学之后，经费有所增加，熊庆来毫不犹豫地马上用相当一部分经费来聘请优秀师资。

熊庆来“慎选师资”时，有如下六个特点：

（一）注重学术名气和学术地位

1938年，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浙江、中法、华中、同济、中山等战区的大学也陆续迁到云南，还有一些研究所也搬到了昆明。熊庆来抓紧这个大好机会，利用自己的学术声望，从云集到昆明的专家学者中，聘请学术名气和学术地位高的教师以充实云大师资力量。聘请方式灵活多样，有借聘、有兼任，还有以办讲座的形式聘请的。

于是，很多治学严谨、硕果累累的知名教授、学者进入云大执教，如顾颉刚、陈省身、华罗庚、刘文典、吴文藻、楚图南、费孝通、姜亮夫、潘光旦、钱穆、霍秉权、范秉哲、白寿彝、胡小石、庄圻泰、华岗、罗庸、吴富恒、秦仁昌、刘尧民、周新民、金善宝、秦仁昌、尚钺、向达、彭桓武等。云大成了与西南联大同享盛名的又一处著名的专家学者荟萃之地。抗战期间云大的专任教授最多时达到187人，兼任教授达40多人，师资质量之高是云大历史上空前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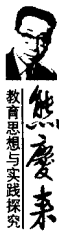
（二）着重从云南的条件和地方需要考虑

熊庆来从云南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丰富、民族众多的实际出发，首先侧重聘请长于数理、文史方面基础学科教学的教授和采矿、冶金、动物、植物、社会人类学及教育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又从云南医疗卫生、农林落后的实际出发，注意聘请医学、农林方面的专家，以加强这方面的教学力量。

（三）兼收并容，不拘一格

熊庆来选聘师资时，除尽力多聘名教授外，对一些在教学、科研方

^① 参见陶李：《熊庆来与云南大学》，载《熊庆来纪念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3页。



面确有突出成绩或为知名学者、教授推荐的青年专家，熊庆来也往往破格提高学衔聘用。对某些有一些缺点的教授，只要他们学术水平高、名气大，他也以优厚的待遇聘用。所以很多人称赞熊庆来“有蔡元培兼收并容的风度”。

（四）坚持“重质不重量”、“讲求效率”的原则

熊庆来聘任教师时一般都很注重真才实学和能力。谁如果工作效果不佳，那下学年的聘书就收不到了。此外，当时不可避免地有极少数人通过政治关系、人事关系进入学校，但他们也要在工作中表现出确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工作能力和经验，才能立足于云大。对情况不够了解的人选，熊庆来态度慎重，多次考察，或直接交谈，或侧面了解情况，直到认为合适时，才正式聘用。

（六）严格要求教师

熊庆来除执行教育部颁发的《大学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审查暂行规程施行细则》精神外，还主持制定了一个《云南大学聘任教职员服务暂行规程》，内容共12条，其中特别强调：每年聘任一次；教职员均以专任为原则，若在外兼课须得校长同意并以不妨碍本校工作为原则；副教授、教授每周授课以9~12小时为率，如兼各处长可酌减；教职员有履行校务会议、教授会议、教务会议、训导会议等议决案之义务。

熊庆来对教师的专业考核非常认真，对职称的评定抓得很紧，标准也严，且不徇私情。如对一位留学法国10年归来的教师，第一年也只是先给了讲师职称。再如庄圻泰在清华时就跟随熊庆来当研究生、助教多年，后又留法4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归来，很有成就，可是到云大后，熊庆来也只聘他为副教授。

（六）注意罗致新秀

熊庆来在刚到云大第一个学期的开学典礼上，便表明了这个努力目标——要将“滇中及邻省英俊之少壮学者，尽力罗致襄教，使一方面服务，一方面研究，以成良好学人，为他日学术上之栋梁。”他在聘用师资时，对确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教师，大胆破格擢用。如1934年毕业于清华的吴晗，学生时代便潜心从事明史研究，后留校任教员，几年间发表了20多篇卓有见地的明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成就突出，在国内史学界享有声名，熊庆来经清华同意后，1937年9月将吴晗借聘来云大，聘为教授。接着，聘到云大的还有顾建中、朱德祥、吴征镒、李埏、胡维菁等20来位各学科的优秀青年教师。抗战胜利后，熊庆来又从云大和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选聘了20余位优秀者。这些青年教师几年后都成了各相关学科的骨干教师，多年后都成了知名教授。

由于熊庆来聘用师资时坚持上述做法，使得云大的教学水平与其他国立大学差距不大，出现了比过去活跃得多的教学气氛与科研气氛，对学生开阔视野、及时接触世界文化科学技术新成果很有帮助。

抗战胜利后，聘到云大的原联大教师和其他学者多数陆续复员返乡。熊庆来抓紧机会，征得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同意，提高留滇之外省学者待遇，通过多条措施和不同途径，争取优秀教师来云大执教，并着力培养本校青年教师和优秀生。因此，直至1949年，云大仍有140多位教授，为新中国建立后云南的高等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三、严格要求学生，提高学生素质

熊庆来一贯认为，严格要求是使学生成为有用人才的必要条件。他多次强调说：“要努力把云大办成小清华，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慎选师资，一条是严格要求学生。”

熊庆来在清华时，受校长梅贻琦主张的“通才”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法国留学多年中，又受法国注重专门学科领域的广泛基础训练的影响。因此，他一再强调云大要培养的学生是基础广泛厚实的某一学科领域的普通专门人才。熊庆来这一办学思想也是符合当时国民政府提出的“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创业之通才与专才之教育”的宗旨的。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使云大毕业生“其造就不在一般国立大学生之下”，熊庆来厘定学则，严格加以施行；整顿学风，整饬校纪；严格考试制度，严惩考试作弊行为，实行淘汰制。他注重学生的平时成绩，规定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三分之二，学期考试成绩仅占总成绩的三分之一。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学生素质和教学质量。

严格考试制度包括两个环节：

一是严格入学考试，提高入学新生的水平。抗战期间熊庆来采取与西南联大联合出题、联合招生的办法，规定最低录取分数线。录取时，考虑到云南中学生的实际水平，云大录取线比联大低 10 ~ 15 分，与联大新生入学水平的差距不大。

二是严格各学期考试及毕业考试，严惩考试作弊者，处分办法包括扣分、警告、记过，直至开除。熊庆来用这种办法提高学生素质，增加淘汰率。在记分等级上采用清华、南开等校的 6 级记分制，学期总学分 $2/3$ 不及格的除名；一学年内总学分有 $1/3$ 不及格的留级；有 $1/2$ 不及格的除名。毕业考试由部派人员与校方推荐人员组成的毕业生考试委员会组织进行，所考科目由考试委员会决定。

在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熊庆来还努力采取措施，增加学生人数，以扩大学校教学规模。熊庆来上任时，云大学生数为 302 人，熊庆来到任的当年底，学生数就翻了 1 倍多，为 680 人。1949 年，云大学生数已达到 1 500 人，熊庆来兴奋地说：“全校学生人数激增至千五百人，更加厚学校之弦诵空气。惟校舍缺乏，茅屋陋室，亦皆充分利用，然同

人以此西南学府之生命力得以加强，精神得以提高，反觉不改其乐。”^①

四、发挥教授作用，建立高效机制

熊庆来到云大后，在云大行政管理体制上，也采取清华大学由校长领导下的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成立了校务会、教务会、教授会；设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和会计室、统计室、人事室，扩大建制为文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5个学院。校长直接领导这三会、三处、三室、五院。

在“三会”中，校务会议的主席是校长。校务会议的职权是审议学校中有关人事、财务经费、建筑等重大事项。下设各种常设委员会如经费稽核委员会、聘任委员会、招生委员会、训育委员会、毕业生审查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建筑委员会及其他委员会。校务会议对学校重大问题有立法、审议、议决权。对各常设委员会的委员主席有任免权，对常设委员会的立法有审议、决议权。审议若发生争议时，校长有最后决定权。校务会议参加者为三大处长、各院院长、会计室主任、各系主任及教授会代表（一般是5人）和与审议事项有关的委员会主席。由于院长、处长、系主任及各委员会委员都是教授，所以，实际上形成了校长控制下的教授治校制。

教务会议由教务长和各院长、系主任、教授会代表组成，主要研究教学工作，由教务长主持，在教学问题及与教学有关的重要问题上有立法、审议、议决权。

教授会由正、副教授参加组成，设有常务委员3~11人，由教授们推选，校长为当然委员和主席。教授会一般只是咨议机构（顾问、参

^① 熊庆来：《本校之学术生命与精神》，载《云大二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49年4月20日。



谋)。校务会议与教务会议都要邀请教授会派出代表参加。教授会对校务会议、教务会议中与教授们有关的重大问题也有议决权。^①

可是云大毕竟不如清华的历史长，实行教授治校的历史更是远不如清华的历史长，经验也还不足。最初几年间，熊庆来差不多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校务上。

熊庆来在云大倡导建立高效率的办事机制。学校只有1个校长，没有副校长。职员也不多，行政机构也不多。各院设院长1人，各系设系主任1人，各院、系都没有专职职员。熊庆来善于用人，也信任人。他给予各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在很多问题上的自决权，尊重他们的决定。只要拿得出成绩，把系搞得好的，把学院搞得好的，他总是放手让你干。

熊庆来非常注意提高工作效率。在他的亲身表率带动和严格要求下，整个学校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都很高。教务处下设注册、出版二组。全校的有关招生、注册、学生的成绩档案、毕业事宜、教室安排、排课计划等教务方面的事务，都由注册组负责。注册组职员只有几个人，可是每学期开学前都把全校这么多院、系的几百门课及当时数量极有限的教室安排得井井有条，从未出现教室冲突、课程冲突、教师碰头的情况。

五、重视科学精神，加强科学研究

培养研究风气，是熊庆来办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大学的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之生命与精神”。学术的生命与精神是什么？熊庆来做过这样的阐释：“其生命系表现于所有之教学工作、研究工作，以及师生之种种高尚活动；其精神，内则表现于教学之成绩，钻研之结果，与君德行之砥砺，外则表现于师生对社会之影

^① 吴道源主编：《云南大学志·总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页。

响，校友对社会国家服务之努力。”^①

1937年9月16日，熊庆来在任云大校长后第一个学期的开学典礼上，便精辟地分析了国外大学的优点：“一、基本课程精当切实，社会需要之高等技术人才，可由此产生。二、研究设备完善，教师指导有方。有志后进在良好环境、良好指导下，得熏陶磨炼，成为学术上之支柱。三、对于学术本身有重要贡献，于学校之精神上，增加无上之价值。盖学校不仅是一培植人才之机关，而同时是一学术之源泉。巴黎名教授亚贝尔氏说‘大学而无思想之供给，其所传授必枯燥而寡味’。所以现代著名的大学，都不外在此三方面，有很大的努力。”

长期在清华任教、受欧美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影响较深的熊庆来深知要改进大学、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于开展科研。所以，他积极提倡科研，大力推动科研，并从一些具体措施上尽力加以保证。比如，当时聘用教师时，在聘书上就特将聘用经费具体明白地分列为生活费和科研费两项聘金各为多少。由此亦可充分看出当时熊庆来是怎样重视教师的学术研究的。

而要开展科研，培养浓厚、活跃的学术空气，没有必要充足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是不行的，熊庆来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多次明确地强调过：“非有充实之设备，亦不足以言研究。”

熊庆来到云大的前一年，全校图书仅有42 000多册，仪器仅700多件，标本仅23件。这样的图书条件和设备条件，要开展研究工作，实在是很困难。1938年云大改为国立后经费有所增加，但由于货币贬值，实际购买力却有所下降，熊庆来上任之后，一直为经费不足所困扰。他到处奔波，争取各种渠道的资助。

从改国立后的头两年来看，在1939年度内，云大所获得的专款补

^① 熊庆来：《本校之学术生命与精神》，载《云大二十七周年纪念特刊》，1949年4月20日。